

【书里书外】

汪曾祺出书



【生活小景】

儿童节的马面裙

□孟菁

儿童节要到了,小女儿幼儿园要举办一场特别的亲子服装秀,要求妈妈和孩子一起穿上最有创意的衣服进行展示。我听说不少妈妈已经积极准备,有的从网上选购了可爱的卡通形象服装,有的亲手缝制了温馨的亲子装,还有的妈妈将旧衣服改造成了新颖的设计。我苦思数日后,仍然没有找到一个与众不同的创意。

上周日午后,我偶然间瞥见上初中的大女儿的国画作品渐显雏形,宣纸上的墨迹未干,散发着淡淡的墨香。我脑海中灵光一闪,何不利用这些蕴含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书法纸张,打造一款独一无二的马面裙呢?

我将这个想法分享给孩子们时,大女儿欢呼雀跃,连声称赞这个创意绝妙。小女儿则眨巴着眼睛,好奇地问道:“妈妈,马面裙是什么?”我微笑着给小女儿解释我们国家的传统服饰马面裙。

看着小女儿似懂非懂的表情,我随即从网上搜索了大量马面裙的图片展示给她看,并继续解释道:“你看这些古代女性,她们穿着这种裙摆宽大的裙子,不仅行走方便,而且飘逸动人,宛如翩翩起舞的仙子。这就是我们东方服饰之美。”小女儿看后双眼放光,满怀期待地说道:“妈妈,我也想穿这样美丽的裙子!”

说干就干,我翻箱倒柜找出了家中的旧窗帘。虽然窗帘已有些年头,但其质地厚实,而且颜色和图案都散发着中式韵味,与我想要的马面裙风格不谋而合。

我参照网上马面裙的样式精心绘制了图纸,在旧窗帘上进行裁剪。大女儿挑选了她最得意的书法作品,将其剪裁成合适的形状作为装饰。我们巧妙地将这些元素融合在一起,同时在裙摆处保留了完整的诗句。这些诗句的意境与裙子的飘逸之美相得益彰。如此一来,裙子不仅外观华美,更散发着传统文化气息。小女儿找来了几幅荷花图,提议做成裙摆的装饰。这个小小的点缀使得裙子又添了几分别样的风情。

看着小女儿兴奋地穿上这条马面裙,在镜子前欢快旋转,我感觉在舞台上还缺少了些装饰道具。大女儿灵机一动提议道:“我们可以用剩下的荷花图制作成折扇来搭配裙子,这样就能与裙子形成完美的呼应,打造出一个荷花主题的服装展示。”好创意!于是我们母女三人齐心协力制作了两条精美的马面裙和配套的荷花折扇。

走秀当天,我和小女儿穿着我们亲手制作的马面裙,手持荷花折扇,步伐轻盈地走上T台。马面裙随着我们的步伐轻轻摆动,书法字迹在阳光下若隐若现,荷花折扇更是为我们的造型增添了几分雅致。观众们纷纷为我们的创意和手工鼓掌喝彩。

展示结束后,我向孩子们介绍马面裙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尽管幼儿园的孩子可能还不完全理解这些历史的深沉与文化的博大,但我深信,在他们的心田,已然播下了一颗种子。随着他们的成长,这颗种子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本文作者为某大型民营企业财务总监,江苏武进作协会员。)

□段春娟

汪曾祺对自己的文字是绝不造次的。他很有意。他说过作家要时时处处锻炼自己的语言,哪怕是一封信、一个便条,甚至一个检查也要写好。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打磨语言的机会。他曾感叹:“鲁迅的书信、日记,都是好文章。”其实他的书信也很可观。

近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汪曾祺全集·书信卷》,又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汪曾祺生前出版的二十余本自选集,多能从书信中读出些蛛丝马迹。因每出一书,他都会向亲朋好友预告,跟出版社的编辑交流,出版后还要送人,等等。出书前的各种准备,出书过程中的等待,书出后的欣悦或不满,甚或无奈、遗憾等诸多情绪,也每每在书信中有所体现。

《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出版于1982年2月。作为北京出版社“北京文学创作丛书”之一,内收新中国成立前后所写小说十六篇。起初汪曾祺对此书的出版并不热衷,是在友人林斤澜、邓友梅、葛翠琳等一再催促、鼓励下完成的,然一旦列入出版计划,他还是对此书很在意。

早在1981年9月28日,他给同乡陆建华的信中说:“以上诸篇都已收在北京出版社的《汪曾祺小说》里了。这选集大概十一月即可出书。零散搜寻,颇为费事,你不如等书出后一总看吧。”其时陆建华任职于高邮县委宣传部,正在做汪曾祺研究。

1982年3月27日,他给曲阜师范学院学生汪家明回信,介绍最初出版的三本书:《邂逅集》《羊舍的夜晚》及《汪曾祺短篇小说选》。信中说:“81年5月以前的,都已收入北京出版社的《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这个选集大概四月可以出版。出版时我大概不在北京(下月初我将去四川),如样书寄到,我当嘱家人寄一本给你。”实情是,写信时书已出版,只是当时他并未看到。汪家明的毕业论文拟写汪曾祺,写信向作家本人咨询。汪曾祺夸他“生气虎虎”,并预祝写出一篇“出色的、漂亮的、有才华的论文”。

不难看出,汪曾祺对新时期的第一本小说选是充满期待的,也急于向人推介此书。

《晚饭花集》是汪曾祺新时期出版的第二本小说集。1983年9月16日,他致信汪丽纹(异母妹)、金家渝(妹婿)、汪海珊(异母弟):“《汪曾祺短篇小说选》以后,我又写了十八篇小说,够再编一个集子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定下了。今年十月下旬交稿,明年四月出书。书名《晚饭花集》。书出,当寄给你们。”《晚饭花集》实共收入小说十九篇,最后一篇《金冬心》,作于1983年10月25日,写此信时尚未写出。

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汪曾祺多次跟人提及这本《晚饭花集》。

而在1985年5月2日致宋爱萍的信和6月5日致宋志强的信中又都提及,因了“一个荒唐的错误”,即在封面上把作者的名字印错了,封面需重印,又得延迟出版。《晚饭花集》版权页上的出版时间为1985年3月,看来重印的只是封面,其他并未动,只是书正式印出的时间往后拖了两三个月。

从这些信中亦可看出,汪曾祺对《晚饭花集》的出版怀着热望,盼着它快快面世。

这两本小说集的印数都相当可观,《汪

曾祺短篇小说选》印了21000册,《晚饭花集》印了47000册。从信中亦可看出,这两本小说集的出版,汪曾祺是欣喜的、满意的,没出版之前就与亲友广而告之,书出后更是送人多。他1987年去美国参加国际写作计划三个月,带的就是这两本新出的小说集,书不够送人的,还写信嘱夫人施松卿,再续寄一些去。

《晚翠文谈》是汪曾祺新时期出版的第三本书。这是一本创作谈。从书信中可以看出,与前两本小说集相较,这本书的出版有些惨淡。出版周期长,耗时近5年,费了不少周折,换了数家出版社,印数又极少。这在他的自选集中应算个异数。

据汪朗(汪曾祺哲嗣)回忆,编这本创作谈是林斤澜的建议:“林斤澜要爸爸把所写的谈文学创作的文章汇编成集,找地方出版。爸爸出的作品集,都是有人要出版才编的,从来没有拿着稿子找过人,也不会。唯独这本《晚翠文谈》是例外。那是1986年,当时这种文论集不被人看好,出版很难。林斤澜连赔时间带搭面子,联系了好几处地方,最后还是由他老家的浙江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把书出了。”

1983年8月11日,汪曾祺致信弘征说:“前在长沙,出版社约我将谈创作的文章编为一集……创作谈需在十一月以后动手编。材料不凑手,可能要拖到明年了。”这应是书信中首次提及要编创作谈一书,但从中看不出究竟是哪家出版社约的书稿。弘征为汪曾祺刻过印,曾任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湖南文艺出版社总编辑,《芙蓉》杂志主编。

1984年12月19日致信邓友梅:“北京出版社要出我的创作谈的集子,我想把几篇评论也收进去。《漫评<烟壶>》在数。这期《文艺报》我搞丢了,你有没有?如有,望把这一篇撕下来给我。”正在这封信中,首次提及是北京出版社对创作谈有了出版意向。

1984年12月24日,他致信朱德熙(语言学家、西南联大同学):“我近几个月很少写东西,为《滇池》写了两篇‘昆明忆旧’:《跑警报》与《昆明的果品》。过了年想把评论集起来,集名《常谈集》。”此信可看出,创作谈起初曾命名为《常谈集》。

在1986年8月20日汪曾祺致金家渝的信中,情况又发生了改变:“前两天编完了我的一本创作谈和评论的集子,名曰《晚翠文谈》,交给浙江文艺出版社了,大概明年上半年能出版。”此时,创作谈有了正式名字《晚翠文谈》,出版方也由北京出版社转至浙江文艺出版社了。

书稿到了浙江文艺出版社,大概也非一帆风顺。林斤澜曾写信给出版社编辑李庆西从中斡旋:“汪曾祺说,你看了《晚翠文谈》稿后,给他去信说‘大部分可用’。此事有些意外。汪老的文章你们都是推崇的,年近七十,今后的集子恐不多得。原先和温总一起,在我家说定不作删削。而后由我帮汪编出来,请你们多所考虑,最好照发,要挑也只能挑出无关紧要的个别篇章。‘大部分可用’不妥。”

从1987年4月2日到1988年3月29日,汪曾祺共有九封信是写给徐正纶的。其时,徐为浙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负责《晚翠文谈》的复审及终审工作。这九封信时间跨度近一年,主要是与他商量《晚翠文谈》一书具体的编辑事宜,包括字句的修改、开本、版式、封

面的设计,等等。

1987年4月2日的信中言及具体字句的修改、篇目的安排,并对开本形式提出建议:“版式、装帧,由你们决定吧。如果能用大32开,最好,题目若能多占几行,则‘宽松’些。封面我想你们不会搞得太洋。过于现代派,与文字内容不相合。如用底色,希望不要用墨绿的。我的两本小说集的封面都是墨绿的,出版社提出的理由是:这和作者的年龄相称。真怪。斤澜把文稿交给你们时,夹进我自己手写的书名,不一定用我手写的字,那几个字也写得不理想。”

同年5月8日,又有一信致徐正纶:“昨日得斤澜转来信。所需照片及签名寄上。照片在《汪曾祺短篇小说选》上用过。但我手头别无其他黑白的照片,只好再用一次。签名用毛笔、钢笔各写了两式,请选用。”汪曾祺积极配合出版社,提供编辑设计所需相关材料,从中亦可看出,林斤澜在参与此书的出版,这与汪朗的回忆文章是相致的。

汪曾祺后来在美国给夫人施松卿写信(1987年11月24日)说:“反正在国外就是这样,交情是交情,钱是钱。像林斤澜那样和浙江洽商《晚翠文谈》,门也没有。”足见林斤澜在这本书的出版上是帮了大忙,且分文不取的。

1988年3月29日,有致徐正纶的最后信:“我想买200本,好送人。请代办下手续。所需书款,请于稿费中扣除。”信中还说:“看版权页,印数只有2700,我心里很不安,这本书无疑将使出版社赔钱。应该表示感谢的是我。我对浙江文艺出版社肯做这种赔本买卖,深致敬意。”看到那么少的印数,汪曾祺很无奈,对出版社也深怀歉意。

《晚翠文谈》封面设计所用正是汪曾祺的题字,风格淡雅隽永。选文共42篇,分为创作谈、文学评论、戏曲杂论、民间文学论文四辑。在《自序》中,他陈述了取名“晚翠”的由来:“我自二十岁起,开始弄文学,蹉跎断续,四十余年,而发表东西比较多,则在六十岁以后,也真够‘费劲’的。呜呼,可谓晚矣。晚则晚矣,翠则未了。”对既往的岁月,幽默、自嘲、慨叹,都有了。

对于书的出版,汪曾祺的标准、眼光都是极高的。此书出版过程极长,他有足够时间来精选充实内容,即便如此,他仍不满意。书出后两个月,他给时任《山西文学》杂志主编的李国涛寄去一本,并于5月6日致信给他:“这本书各篇分量、质量参差不齐,我准备过些年再攒一点,精选一次。”

实情是,《晚翠文谈》从初版直至汪曾祺去世的1997年,9年中没有再版,他“准备过些年再攒一点,精选一次”的愿望生前并未实现。

《晚翠文谈》是汪曾祺创作观、创作经验的集粹,更是先生的夫子之道,是解开其文学世界的秘钥。时至今日,学界对汪曾祺的解读、评介多不胜数,然立论多以此为基础。解读汪曾祺其人其文,这本书是不应错过的。

笔者因爱读汪曾祺,爱屋及乌,也有个小小的梦想,想拥有部分自选集的初版本。上旧书网查阅,初版的《晚翠文谈》已卖到二三百元一本。当年印数极少,如今物以稀为贵了。这也颇具喜剧色彩,大概汪先生九泉之下也想不到吧。

(本文作者现任职于山东财经大学。)